

論瑞典自行選擇中立戰略之作為

郭秋慶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

摘要

如同吾人所知，瑞典自從 19 世紀以來沒有介入任何的軍事衝突，瑞典的中立地位並沒有載入憲法，更沒有被任何的國家和國際組織所承認。本研究檢視瑞典外交上的中立戰略選擇。自從維也納會議(1814 年)以來，瑞典決定放棄它的軍事攻擊本質，開始採取中立的外交戰略，甚至在兩次大戰的威脅下，瑞典仍繼續奉守它的中立戰略。戰後瑞典採取「和平時期軍事不結盟，以利戰爭爆發維持中立」，以及防衛上採行領土與主權自我武裝的防禦政策，因此瑞典建立和維持充足的軍事能力，它的軍方和政府同時參與國際維和行動。

關鍵詞：中立國、瑞典中立、武裝中立、軍事不結盟

壹、前言

小國（廣義上指中小型國家）身處國際社會，先天的條件不足，譬如領土偏小、人口稀少與資源匱乏，加上軍力有限，是國際社會的弱勢成員，在因應國際社會的挑戰，常缺乏足夠的能力，尤其是面對周圍的強權，隨時都有可能遭受壓迫或欺凌。為求國際社會的生存與發展，小國確實有需要針對地緣政治和經濟，考量對其較為有利的對外戰略。

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外交方針或取向，是國家對國際環境的態度與承諾。如果國與國之間爆發軍事衝突，靠近衝突中心者將受到影響，此時採取中立是避免捲入衝突的方法，所以中立是一種戰略選擇。

北歐諸國中，瑞典屬於中小型國家，迄今是世界上和平維持最久的國家，它在兩個世紀的時間自立地樹立起明顯的永久中立國形象，不像瑞士、比利時、盧森堡或奧地利等作為永久中立國，有國際條約的承認。瑞典人對和平的堅持，對世人而言確實是一個榜樣。

瑞典中立的戰略選擇，是其最佳與最安全的政策。本文將針對瑞典創造與推行獨特的中立外交，從地緣環境、背景與軍事力量，對它是如何長期奉守中立主張，以及中立戰略的演變，作深入的探究。

貳、選擇中立主張的背景

瑞典採取中立是出自地緣戰略考量（Jervas, 1986: 3）。首先，它位於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東部，東面有芬蘭位於它與傳統強國俄羅斯之間，其西北則與一個歷史上曾長期受其支配的傳統弱國挪威相鄰，而其東南與西南則由丹麥海峽連接波羅的海和北海沿岸，從而將其與歐洲大陸分隔開來。這種有利的地緣位置，讓入侵國相當不易得逞。

傳統上，瑞典執行武裝中立（armed neutrality），是因為中立國仍需要預期領土可能遭受攻擊，武裝準備為的是使周圍強權考慮，是否佔領瑞典的利益大於彌補它的損失（Zartman, 1954: 145）。一旦遇到戰爭，軍事武裝能協助排除非法的限制性手段阻礙貿易。19 世紀中葉以來，瑞典開始增

強軍事能力，二次大戰前不久，軍事改革一度將部分工業轉為軍火製造業，成立國民軍（Fenwick, 1917: 333），國內不管是自由派政黨、保守派政黨或執政的政黨，對強大國防的需求沒有不同意見，相關的計畫案也加以支持，而且這樣的一致觀點，較其他非中立的小國更是明顯地表示出來（Zartman, 1954: 145）。二次大戰後，以相對強大的國防力量為後盾，在北約與華約軍事集團之間保持中立和平衡，以維護自身的利益（Hallenberg, 2000: 19）。

冷戰時期，由於蘇聯的攻擊計畫含蓋北歐國家，期盼軍事控制當地，以利推進北大西洋地區。再者，蘇聯有興趣控制波羅的海通道，戰時將它當作修復華約軍事組織船隻場所。此外，瑞典東海岸一部分疆界面對社會主義國家，這個波羅的海區域面臨蘇聯偵察機與潛水艇等威脅，所以瑞典的國防著重建立強大的空軍和海防部隊以達成嚇阻作用。瑞典的國防著重自力更生，許多自行設計和製造的軍事裝備，像戰鬥機與潛艇等具世界一流水準，而且多數飛機和大炮等自給自足。空軍的排名長期名列世界第四，國內約 30 座空軍基地和許多小型飛機庫房，和高速公路有所連通，以便戰時將其作為飛機跑道。空軍的任務之一是，在波羅的海阻止蘇聯飛機攻擊北約國家的核子潛艇。基於戰略考量，瑞典海岸的大型地下設施安置超過 90 支重型大砲，以及許多地下碉堡和機槍。

瑞典一個世紀以上實行徵兵制，2010 年後改採募兵制，預計到 2018 年可以全面實施，不過遇到緊急狀況徵兵制仍是選項，1990 年總兵力達 65 萬名，但 2010 年總兵力降到 21 萬名，在冷戰期間軍事開支，1962 年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4.11%，1972 年占 GDP 的 3.52%（Murdoch & Sandler, 1986: 591），但冷戰結束以來有所降低，像 2010 年占 GDP 的 1.2%，2015 年占 GDP 的 1.24%，總計 50 億 7,700 萬美元，居世界排名第 31 名，每年的軍事開支，大約一半用在部隊操作，另一半則投入研究、開發和材料更新。

參、執行中立戰略的作法

一、自行作出的政治選擇

13 世紀中葉瑞典形成統一的封建王國，此後開始對東方擴張，佔領了整個芬蘭，1397 年瑞典、丹麥和挪威在瑞典南部靠海的卡爾馬 (Kalmar) 城市共同籌組三國共戴一君王的卡爾馬聯盟 (Kalmarunionen)，其後由於丹麥圖謀主導地位，令瑞典不服，16 世紀瑞典貴族小斯圖爾 (Sten Sture) 從事反抗運動，爭奪權利與利益，演變成民族之間的衝突，瑞典乃脫離卡爾馬聯盟，這次戰爭被視為民族主義的開端，1630 年古斯塔夫·阿道爾夫二世 (Gustavus II Adolphus) 更決定介入歐洲三十年戰爭，以保護新教與擴大國家在歐洲的影響力，以及對俄羅斯與卡爾馬聯盟剩下的丹麥-挪威聯盟作戰，多年戰爭後國家領土獲得擴張，至 17 世紀時瑞典領土為目前的兩倍，成為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強權，但是 1809 年瑞典佔領的芬蘭遭到俄國入侵，而且英國國勢日益強大，國家的戰略被迫不得不收縮 (Bergquist, 2000)。

1814 年維也納會議列強的權力被調整，帶來相互的平衡並保持和平，不過 1834 年中東危機造成英國和俄國軍事衝突一觸即發，瑞典國王卡爾十四世·約翰 (Karl XIV Johan) 基於戰爭和結盟，最後陷入昂貴代價和無所獲益，乃約束北歐國家採取嚴格中立立場，從此奠立瑞典中立的傳統基礎 (Ferreira-Pereira, 2005: 465-66)。

其後，瑞典受丹麥和德國爭奪什列斯威-霍爾斯坦的戰爭、克里米亞戰爭以及德國和丹麥戰爭的影響，為了國家的獨立，政府開始推展不捲入戰爭的冒險性外交政策，此一中立主張充分表現在 1864 年普魯士聯合奧地利發動對丹麥王國的戰爭，因為丹麥處境岌岌可危，希望瑞典一起籌組防禦聯盟抵抗侵略，卻遭到奧斯卡一世 (Oscar I) 國王拒絕 (Thomas, 1996: 18)。從此中立的世界觀，在兩次世界大戰時期依舊激勵瑞典奉守中立主張。

迄今，瑞典中立的主張不像瑞士或奧地利，並沒有法律基礎，也未載入憲法條文，更談不上有國際條約保證 (Holsti, 1972: 106)。國家的安全，

是基於地理位置、歷史、強鄰利益的戰略警覺以及國家的優先性，所自行作出的政治決擇（Ferreira-Pereira, 2005: 466）。

二、渡過兩次世界戰爭的考驗

一次大戰爆發伊始，瑞典動員軍隊，隨時準備應付不測。當英國和俄國計劃通過瑞典打通俄國與西方列強的聯繫，瑞典高度緊張，而德國又多次引誘瑞典反俄國，然而各黨派一致聲明支持政府嚴守中立，避免捲入戰爭，同時與交戰雙方繼續保持貿易關係。待一次大戰快結束時，由於德國軍隊兩面作戰，波羅的海對侵略國形成一定程度的障礙，而且瑞典軍事裝備也尚稱精良，所以中立主張較容易維持。不過，瑞典還是相應地對交戰國作出讓步，譬如在德國壓力下，將松德海（Oresund）（丹麥的西蘭島與瑞典之間海峽）用水雷封閉，阻擋協約國的船運，甚至蒙受一些屈辱，以便保證獲取物資的供應。

一戰結束之後，瑞典的外在環境並無重大戰略顧慮，因為德國戰敗處境不佳，蘇聯剛成立國力薄弱，芬蘭和三個波羅的海國家是新興獨立國，其中丹麥和挪威雖然國力增強，但是它們對外還蠻友善，所以瑞典採取厚道的（benevolent）外交政策，加入國際聯盟，並聽從它對國際事務的決斷，譬如將說瑞典語的奧蘭島（Aaland Islands）在當地居民反對下割給新成立的芬蘭共和國，其後為了德國加入國聯，瑞典將當常任理事國的機會讓給它。再者，瑞典希望國聯能夠建立國際秩序，歷屆政府積極支持國聯籌建集體安全和裁軍計劃，只是國聯的表現令人失望，1936年國聯對義大利的制裁證實無效時，瑞典即偕同其他小國宣佈，今後將自行決定是否參加國聯發起的制裁行動（Hagglof, 1960: 154），同時重新執行嚴格的中立主張。

反觀瑞典國內，1925年它裁減國防經費，達相當的規模，堪稱其他國家的典範，不少瑞典著名人士也相信政治家是有能力透過國際法和外交，創建穩定與公正的國際秩序（Sundelius, 1990: 117）。但是1930年代中期納粹德國崛起，蘇聯政權鞏固，以及國聯瓦解，瑞典開始恢復傳統積極的防衛策略。二次大戰爭爆發，瑞典奉守中立主張，內閣首要目標是避開戰火，決定「所有有關執行中立的規定，不僅適用於目前正處於戰爭的國家，

也適用於可能捲入戰爭的任何其他國家」。不過，蘇芬戰爭時，北歐形勢發生變化，國內要求援助芬蘭的呼聲強烈，但是內閣主張任何與納粹德國對抗的行動，適足以捲入戰爭漩渦，僅為芬蘭提供一定的物質援助，同時拒絕英國要求假道瑞典向芬蘭派遣軍隊，也宣告瑞典的領土不得建立外國基地 (Nissen, 1983: 81)。

其次，納粹德國展開對丹麥和挪威軍事行動，瑞典束手無策，基於納粹德國要求「只有傾向於德國的中立，才是保證不被侵犯的唯一道路」，瑞典不得不妥協，不削減對德國的鐵礦石出口，並接受裝載休假士兵和軍需補給的納粹德國列車，穿越自己的領土來往於挪威 (Hagglof, 1960: 162)。

待 1943 年 4 月瑞典國會 (Riksdag) 提議終止納粹德國到挪威的鐵路運輸，但內閣還在猶豫，因為它尚不能確定戰爭的走向，等到納粹德國入侵蘇聯舉步維艱，瑞典的屈辱得以結束，當年 7 月宣佈取消納粹德國過境運輸士兵，9 月更削減對德出口鐵礦石，及至 1945 年 5 月通知納粹德國中斷外交關係。

在近五年的戰爭中，瑞典被納粹德國包圍，其獨立和中立主張遭受威脅，但是它保持低調並作出若干讓步，而且躲過戰火與避開被佔領，由於瑞典的工業基礎沒有受到損傷，這對於瑞典經濟發展有一定的貢獻 (Sundelius, 1990: 118)。

三、二戰後採取軍事不結盟的中立

納粹德國的戰敗，令美國勢力推進歐洲大陸，1946 年美國駐莫斯科使館資深外交官的長篇電報，建議美國必需準備長期對抗蘇聯，很快地美蘇對峙促成敵對陣營出現，各國普遍採取結盟外交，像瑞典周邊北歐三國—挪威、丹麥和冰島加入美國主導的北約軍事組織 (Steinbock, 2008: 198)，雖然這種結盟將使它們擔負支援同盟國的責任與義務、失去部分行動自由，但是通過外交的結盟，亦可利用比它自身大得多的力量，實現單獨無法達到的外交目標，只是外交結盟能夠帶給它們多大的利益，並不易具體說明的，所以外交路線的決定，最好根據國家具體情況和所處的外部環境而定，當時瑞典即依此維持傳統的中立主張，避免納入超強之間的對峙。

有鑒於 1948 年捷克事件，加上蘇聯史達林邀請芬蘭談判簽訂友好協定，此時瑞典擔心芬蘭成為蘇聯衛星國，恩登（Östen Undén）外長和其圈內的決策者便提議與芬蘭、丹麥和挪威建立北歐防衛同盟，不過美國強調該防衛同盟必須納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加上蘇聯認為瑞典和西方世界最好沒有聯繫（Petersson, 2012: 221），最後在芬蘭和蘇聯簽署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下，瑞典放棄推動北歐防衛同盟，改而維持自身的中立主張，1950 年恩登外長更為中立提出簡潔論述，即不參與國家陣營（power blocs）以及當國際間「橋梁」的角色，待 1955 年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簽署華約軍事組織，瑞典自然就沒有參加。

美蘇冷戰初期，瑞典既沒加入北約，也未參加華約軍事組織。在瑞典的看法下，參與國家陣營只是當「抵押品」，充當的只是突擊隊的角色，因此社會民主勞動黨（SAP）執政下，瑞典重要人物－埃蘭德（Tage Erlander）首相和恩登外長－推動政治中立的嚴格立場。首先，艾蘭德首相任期內經濟的成長顯著，因此武裝力量的建立令人印象深刻，當時僅次於美國、蘇聯和以色列，而且瑞典擁有全球第三大的空軍。再者，恩登外長認為瑞典的中立將強化歐洲的權力平衡，以利長期和平的環境，1956 年他更致力建立外交政策框架，即「和平時期軍事不結盟，以利戰爭爆發維持中立」（Molin, 2000: 261-75）。

肆、不結盟下的積極外交作為

一、提倡國際社會的道德價值

瑞典在和平時期軍事不結盟，為的是國家對外行動的自由或獨立自主，絕對不能將它視為外交孤立。再者，瑞典對外行動的自由，並不是想擺脫戰爭，反而是為國家利益從事跨國合作，使瑞典不致於被認為在美國這邊想當半個同盟國，同樣地在蘇聯這邊則想當被人信服的中立國（Zartman, 1954: 156）。

基於此，在軍事不結盟戰略下，瑞典外交政策，首先針對國際經濟的

穩定展開合作，1947 年參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和 1948 年協助歐洲經濟重建的馬歇爾計畫。再者，1949 年加入歐洲理事會 (Council of Europe)，以保障參與國共同的遺產和促進經濟暨社會的進步，但是當英國外長提出『艾登計畫』 (Eden Plan) 納入舒曼計畫和歐洲防衛共同體，瑞典恩登外長就警告與防衛有關課題不能放到歐洲理事會，否則瑞典退出該會 (Zartman, 1954: 153)。其次，1952 年加入北歐理事會 (Nordic Council) 這個地緣政治的國會論壇，推動非軍事的合作，像經濟、文化與社會福利，具體的項目像關稅同盟、互免簽證、共同勞動市場以及互享所在國的福利待遇等。此外，1960 年加入促進自由貿易的歐洲自由貿易協會 (EFTA)，1972 年更和歐洲經濟共同體 (EEC) 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事實上，瑞典軍事不結盟的中立主張，是需要積極的論述來支持。依照官方論點，國家選擇軍事不結盟，並不會和全球政治的積極主義有所矛盾，反而相互支持。為此，瑞典外交政策轉向積極主義，尤其是 1968 年社會民主勞動黨獲得國會選舉絕對多數，決策者對外交有更大的信心，開始致力於發揮國際社會的道德感，堅持有權利批評反民主、人權和國際法的行為，以刺激世界對國際法和道德的敏感性 (Ferreira-Pereira, 2005: 468)。

首先，瑞典在社會民主勞動黨主政下，支持 1968 年捷克的獨立傾向 (布拉格之春)，批評蘇聯軍事干預。當教育部長的帕爾梅 (Olof Palme) 多次譴責美國對越南的侵略，他還參與斯德哥爾摩反越戰示威活動，年輕世代與知識份子讚揚他是「北越的英雄和美國的流氓」，隔年他當上了總理 (Makko, 2012: 70)，外交上展現出支持第三世界選擇自己的道路；另外，瑞典支持越南人民為獨立戰鬥，抗議美國對越南作戰，尼爾森 (Torsten Nilsson) 外長更主張承認北越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1975 年帕爾梅首相訪問古巴問到共產國家政治犯，稱這都是古巴和美國長期衝突造成的，還說拉丁美洲國家普遍有政治犯。對於伊朗方面，帕爾梅首相則表示，該國革命後忙於用學究式的謹慎建立民主制度。尼加拉瓜桑定政權 (Sandinista regime) 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PLO) 領導人阿拉法特相當欣賞帕爾梅首相，因為帕爾梅支持第三世界用較瑞典政黨更為引人注目方式爭取權力。另外，由於瑞典社會民主勞動黨支持巴勒斯坦，

國內以色列工會被禁止參加由瑞典工會聯盟（Lands Organisationen）的勞動節示威活動（Nilsson, 1988: 27）。1988年安德森（Sten Andersson）外長宣稱，他和以色列與其領導人有長期良好關係，卻拒絕參加斯德哥爾摩市政廳舉辦的以色列建國四十周年慶祝會，而且當年12月安德森外長成為報紙頭版新聞，因為阿拉法特受邀到斯德哥爾摩，和一群來自美國的猶太人出席瑞典政府策劃的巴以衝突調停。阿拉法特在新聞記者會上表示，他堅持承認以色列國事實（*de facto*）存在，此聲明後來為美國決定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開啟談判鋪平道路（Nilsson, 1988: 27）。

二、高舉和平主義旗幟

瑞典和平時期軍事不結盟，推動積極的外交，其中除了倡導道德價值，並推動和平主義（*pacifism*），而且堪稱國際社會表率之一。雖然瑞典的軍火工業向第三世界輸出，但是它對和平的熱愛是牢固的，從時常提出裁軍倡議和斯德哥爾摩設立國際和平研究即是明證（Nilsson, 1988: 28）。

1946年瑞典加入聯合國，直到1960年以聯合國為外交重要舞台。第二任聯合國秘書長哈瑪紹（Dag Hammarskjöld）是瑞典人，他積極以國際公務員身分投入國際舞台，另外瑞典還有不少國際知名人士，為促進國際和平奔走，像經濟學家繆爾達（Gunnar Myrdal）夫婦等，而帕爾梅首相則是南北對話的積極推動者。

哈瑪紹秘書長在1953到61年任期內，基於消除國際不平等是和平事業的保證，致力於協助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Barnes, 1980: 141），1976年起瑞典率先每年從國民收入總額（GNP）提取1%援助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教育以及促進脫貧。迄今，瑞典的援助款是人道援助的大國之一，它同時是發起在聯合國安理會成立解決人道危機機構的國家之一，2000年瑞典更積極投入聯合國千禧年發展計畫。

再者，瑞典認為國際問題的解決，用舊式方法採取暴力行為，有時是可以由第三造當國際調停者，將和平的替代方案強加於交戰國，長期執政的社會民主勞動黨極願意將它挑起來，因此瑞典表現熱心從事解決國際的爭端，而且從不遲疑投入較遠地區的衝突問題，尤其是瑞典過去沒有殖民

地，它在南北問題更處於有利的協調地位。

此外，瑞典認為聯合國維和行動是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最有力的武器，從哈瑪紹秘書長倡導「聯合國維和行動」以來，瑞典多次向聯合國提供維和任務所需的人力和物資，像在北韓、克什米爾、中東、剛果以及塞浦路斯等地監督停火或當軍事觀察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瑞典積極推動國際裁軍，譬如主張美蘇裁軍談判，也參與相當多的裁軍活動，在全球性多邊裁軍談判的「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中，它曾經採取聯合第三世界的策略，促使國際社會注意裁軍的重要性，其它像建議成立全球監測俱樂部，以地震探測法記錄地下核試驗，其後自己也裝置地震監測儀，並公佈檢測結果。再者，1968 年瑞典簽署核不擴散條約，還倡議北歐無核區，引起人們的關注和共鳴。

伍、後冷戰時代樹立新中立戰略

一、參與歐盟共同安全暨防衛政策

1990 年冷戰結束後，瑞典重新審視在歐洲乃至整個世界所處位置，隔年蘇聯解體終止了兩極權力平衡體系，國內出現辯論加入歐洲聯盟的聲音，1992 年在畢爾特（Carl Bildt）首相執政下，官方放棄「中立」用詞，外交上推出所謂「1992 年公式」（1992 Formula），將中立解釋成「不参加軍事同盟，以利周邊地區發生戰爭時，所持的中立能夠不被捲入戰爭」，這是經過縝密討論下的新論述，代表長期執政的社會民主勞動黨公開改變中立信條，1992 年 5 月內閣將它提到國會，經外交委員會討論後獲得國會投票通過。

當瑞典中立主張轉變成僅針對周邊地區發生的戰事，如此一來周邊地區之外發生的戰爭，則不必採取中立主張。換句話說，一旦芬蘭、波羅的海國家、白俄羅斯與烏克蘭遭受攻擊，這些周邊地區的戰爭，將容易波及瑞典，是有必要採取中立主張，而周邊地區以外的地區，像波士尼亞爆發戰爭，便可以參與北約主導的維和行動，這樣的中立新解釋，1992 年畢爾

特首相再透過報紙撰文說明，多數人民開始了解新中立戰略意涵（Ferreira-Pereira, 2005: 464-70）。

1993 年俄軍從波羅的海三國撤離，而且歐盟長足發展，使得歐洲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微小，因此在經濟的動機下，瑞典當年和歐盟展開入會談判，並於 1994 年 11 月將此一入會案提交全民公決，投票率高達 83%，其中贊成票 52.3%，反對票 46.8%，國會終於批准加入歐盟。

瑞典參加歐盟僅表示它是該政治同盟的一部分，在本身主張的「軍事不結盟」下，願意將歐盟作為安全合作平台，參與共同安全暨防衛政策（CSDP）（Christiansson, 2010: 34），不過這並不致於妨礙瑞典外交的行動自由（Fredrick, 2009: 123-42）。自 2003 年歐盟執行維和、人道救援和急難救助等任務以來，瑞典參與馬其頓和非洲剛果維和行動，2004 年參與波士尼亞維和行動，並宣布加入歐盟快速反應部隊，納入所謂「北歐戰鬥部隊」（Nordic Battlegroup），擔負起組建任務，將提供至少 1,500 名兵力與人員，只要在聯合國要求下，該戰鬥部隊在 10 天內即可完成部署。

二、投入北約的維和任務

後冷戰時代在「軍事不結盟」主張下，瑞典仍然不加入北約當成員國，僅願意參與北約從事的維和、危機處理與秩序重建等任務。1994 年畢爾特首相推動參加「和平夥伴」（Partnership for Peace）協議架構，1995 年卡爾松（Ingvar Carlsson）首相推動參加代頓和平協定維和行動（IFOR），1996 年佩爾松（Göran Persson）首相推動參加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的維和行動（SFOR）、1999 年科索沃的危機處理（KFOR）以及 2002 年以來的阿富汗反恐行動等（Ferreira-Pereira, 2005: 473-46）。

當歐盟和北約持續擴大，俄羅斯普丁對外作風強硬，瑞典國內討論參加北約的聲音出現，像自由人民黨鼓吹加入北約，溫和黨表示加入北約是必要與有益的（Steinbock, 2008: 198）。然而，民意調查仍然顯示多數人並不贊成加入北約。依據 2009 年的『瑞典防衛法案』（*inriktningspropositionen*），未來十年國家主權是瑞典達成安全目標的前提，為了維持單一的軍事能力，有需要避免參與北約（Christiansson, 2010: 26）。

陸、結論

基本上，一個中立的小國不管面對何種安全體系，都應該自我適當地進行軍事整建。萬一強權無法在正義的基礎上共事，那中立主張對於小國應該就是緊急狀況。瑞典處在北歐的戰略位置，政治領導人對於強鄰的相互戰爭，體會出自己國家應有的立國之道，為求避開戰爭，採取武裝中立，以便嚇阻外來的侵略企圖。雖然遭遇兩次大戰的考驗，其所奉守的武裝中立有助於渡過戰火，所以說瑞典迄今外交中立是其多年來外交的特色 (Karlsson, 1995: 38) 。

以下僅就本文所述瑞典長期的中立主張，綜合歸納數點個人的看法：

1. 從十九世紀起瑞典刻意脫離歐洲紛爭，避免參與戰爭，決意選擇中立戰略，持續向外宣示並展現此種外交作為，中立可謂是目標價值 (goal value)，雖然它有如烏托邦式的表現，但是事實上這是一種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為因應國際情勢，政府對中立便有新的詮釋；
2. 瑞典始終未和其它國家締結政治或軍事同盟，避開了與列強的職責與義務，因此較不像其他中立國易受強權影響，更能自由地開展外交活動，從事消除這個世界的戰爭行為，所以運用中立所帶來的國際爭端的調停者，形塑了良好的國家形象，增進國際上對其中立的信用。一旦國與國爆發戰爭，瑞典憑藉其所累的中立國信任，將更有機會不會成為國際戰場；
3. 瑞典只不過是國際體系邊陲的小國，但是它對國際社會的發聲，不但獨樹一格，而且創造出國際多元的角色與影響力，因此吾人將瑞典以「中等強權」稱之，應不為過；
4. 瑞典中立的主張執行順利，因此在和平的環境下，有助於國內政治與經濟的穩定發展。雖然冷戰結束以來，中立的主張雖然不見於官方文件，僅主張和平時期軍事不結盟，以求周邊地區發生戰爭時不當作交戰國，這一中立的主張將持續下去，一直到國內外環境有新的改變。

總之，瑞典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中立國，對於台灣而言有其啟示作用。

台灣地緣位置四面環海，對外面臨中國和美國兩大強權對峙和競爭，而且北方有中國和日本的東海領土爭端，南方則有南中國海周圍國家領土與島礁爭端。作為一個小國台灣有良好的經濟發展，為了和平的周圍環境，不妨參考瑞典由執政的智囊團，在維護國家主權下，妥善規劃因應周圍地區爆發衝突與戰爭的作法。

參考書目

- Barnes, Ian R. 1980.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 Swedish Aid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Social Democratic Period of Government."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15, No. 3, pp. 141-50.
- Bergquist, Mats. 2000. "Foreword," in Lee Miles, ed. *Swede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Evaluated*, pp. 1-3. London: Continuum.
- Christiansson, Magnus. 2010. "Solidarity and Sovereignty: The Two- Dimensional Game of Swedish Security Policy." *Connecti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Vol. 10, No. 1, pp. 1-23.
- Fenwick, Charles G. 1917. "The Status of Armed Neutra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1, No. 2, pp. 3888-89.
- Hagglof, M. Gunnar. 1960. "A Test of Neutrality: Swede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6, No. 2, pp. 153-67.
- Hallenberg, Jan. 2000. "Swedish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Lee Miles, ed. *Swede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Evaluated*, pp. 19-32. London: Continuum.
- Jervas, Gunnar. 1986. *Sweden between the Power Blocks: A New Strategic Position?* Stockholm: Swedish Institute.
- Ferreira-Pereira, Laura C. 2005. "Swedish Military Neutrality in the Post-Cold War: 'Old Habits Die Hard.'"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6, No. 3, pp. 463-90.
- Lee-Ohlsson, Fredrick. 2009. "Swede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A Bi-Directional Process of Europeaniz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pp. 123-42.
- Karlsson, Birgit. 1995. "Neutrality and Economy: The Redefining of Swedish Neutrality, 1946-52."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2, No. 1, pp. 37-48.
- Makko, Aryo. 2012. "Sweden, Europe, and the Cold War: A Reappraisal."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4, No. 2, pp. 68-97.
- Malmberg, Mikaelaf. 2001. *Neutrality and State-Building in Sweden*. Basingstoke: Palgrave.
- Molin, Karl. 2000. "The Central Issues of Swedish Neutrality Policy," in: Michael Gehler, and Rolf Steiniger, eds. *Die neutralen und di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1945-1995*, pp. 261-75. Wien: Böhlau.
- Murdoch, James C. and Sandler, Todd. 198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candinavian Neutrality."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 Vol. 88, No. 4,

pp. 583-603.

- Nilsson, Ann-Sofie. 1988. "Swed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Palme Era." *World Affairs*, Vol. 151, No.1, pp. 25-33.
- Nissen, H. S. 1983. *Scandinav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Press.
- Petersson, Magnus. 2012. "Sweden and the Scandinavian Defence Dilemma."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 Vol. 37, No. 2, pp. 221-29.
- Steene, Mikael S. 1989. "Role Model or Power Pawn? The Changing Image of Swedish Foreign Policy, 1929-1987," in Bengt Sundelius, ed. *The Committed Neutral: Sweden's Foreign Policy*, pp. 167-94.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Steinbock, Dan. 2008. "NATO and Northern Europe: From Nordic Balance to Northern Bala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 30, No. 4, pp. 196-210.
- Stråth, Bo. 2000. "The Swedish Image of Europe as the Other," in Bo Stråth, ed. *Europe and the Other and Europe as the Other*, pp. 359-83. Brussels: Pieter Lang.
- Sundelius, Bengt. 1990. "Sweden: Secure Neutralit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12, pp. 116-24.
- Thomas, Alastair H. 1996. "The Nordic Region and Nordic Cooperation," in Lee Miles, e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Nordic Countries*, pp. 15-30. London: Rutledge.
- Ulf, Bjereld. 1995. "Critic or Mediator? Sweden in World Politics 1945-1990."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2, No. 1, pp. 23-35.
- Wahlbäck, Krister. 1986. *The Roots of Swedish Neutrality*. Stockholm: Swedish Institute.
- Zartman, I. William. 1954. "Neutralism and Neutrality in Scandinavia."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7, No. 2, pp. 125-60.

The Strategy of a Neutral Power as Swedish Foreign Policy

Chiu-Ching Kuo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New Taipei, TAIWAN*

Abstract

As most people know, Sweden has not been involved in any military conflict itself sinc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neutral status of Sweden is not mentioned in the Swedish Constitution and not officially recognized by any state 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Sweden's foreign policy of neutrality.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1814) Sweden decided to give up on its aggressive nature and start to take a neutral foreign policy. Even under the threat of two world wars, Sweden continued the foreign policy of neutrality.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Sweden takes the formula "non-alignment in peacetime, neutrality in wartime", and its defense policy rested on the doctrine of self-defense of its territory and sovereignty. Therefore, Sweden creates and maintains strong defense capabilities. Meanwhile, Sweden's military and government have been involved in major peacekeeping actions and other military support functions around the world.

Keywords: neutral state, Sweden neutrality, armed neutrality